

宋代文学研究丛书

宋詞研究



胡雲翼 著
巴蜀



胡雲翼著

宋詞研究



巴蜀書社



出版說明

詞是唐代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特別是兩宋一代，詞的發展達到空前盛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但是詞這種文學形式產生以後，曾一度被貶，俞彥說：“詞末技也……于不朽之業，最為小乘。”紀昀也說：“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但是，大江東去，銅琶鐵板，淺樽低唱，詞壇即不乏千古名篇，絕代大家。而且，由于詞本身形式活潑多樣，較少受律詩似的束縛，因此頗受人們的喜愛。所以，全面評價這一文學形式，公正評判作家作品，係統總結其產生、發展、創新的規律，是古典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工作。胡雲翼先生是我國詞學界的較早研究者之一，他的《宋詞研究》脫稿于“五卅”慘案前夕，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全面、係統地對宋詞進行研究的理論專著。雖然此書著于六十多年前，但今天看來仍不失為一部有相當學術價值的參考書。作者的一些理論觀點即使現在也還是頗見新意的。胡雲翼先生惜已病故，而此書自一九二八年印行後即未再版。此次應作者家屬的請託，對原書個別地方作了必要的文字訂正，餘者一仍其舊，重排印行，以饗讀者。

巴蜀書社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八月



自序

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價值。而作文學史的分工工作，對於宋詞加以有條理的研究和系統的敘述的專著，據我所知道的，現在似乎還沒有。以前雖有詞話，叢話一流書籍，偶有一見之得，而零碎掇拾，雜湊無章。我著這本書的動機，就是想將宋詞成功地組織化、系統化的一種著作。自然這樣一本不過十萬言的小冊子，我決計不敢希冀對於文學界有很大的貢獻。假如愛好文學的朋友們讀了我這本書，能够由此而明瞭：（一）詞的內涵外延，知道：（二）宋詞發展和變遷的狀態，審識：（三）宋詞作家的作品及其生平，也許因此對於詞的欣賞和研究，發生更大的興趣，那便是作者的一點希冀了，不算奢望吧。

記得拙著初稿將要全部草成的時候，慘怛的“五卅血案”發生了。當着那樣舉國悲憤呼喊運動之時，個人亦到處奔走，任務頗多。後來又受武漢學生聯合會之委託，出席上海全國學生總會，并在滬杭一帶，負責宣傳。于是這本書的整理和校對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最近同鄉左舜生先生來函，囑整理付印。適在病中，由友人鏡湖、白華、振翀代為鈔錄標點，這是應該謝謝的。而承舜生先生詳詳細細為我校閱一過，尤其使我深深的心印。

一九二五年胡雲翼序于武昌大學



胡雲翼詞學觀點的歷史反思

——《宋詞研究》重印序

謝 桃 坊

每個時代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認識和解釋傳統，以確定新的歷史出發點。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里，每個時代的學者也都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去審視過去的文學。然而這樣的認識與評價總是有其時代局限性的。歷史王常常出現一種反撥現象，似乎後一時期將前一時期的某種觀念或傾向徹底推翻或否定了，但過了不久又會發現：“這種反撥把前一時期的過激克服了以後，使下一時期吸收了前一時期的實質，同它和解，並繼續了它的運動”^①。當我們回顧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古典文學研究的歷程，正是如此，而詞學研究也是如此。胡雲翼先生是受我國現代新文化思潮影響的詞學家，在其四十年的詞學研究中正反映了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學術思潮主流。在他逝世二十五年之後再來評價其詞學成就時，是不應脫離其歷史文化條件的，尤應看到它在現代詞學研究進程中的意義。

胡雲翼，原名耀華，生于1906年，湖南省桂東縣人。1927年畢業于湖北武昌師範大學中文系，曾在湖南長沙嶽雲中學、南華女中、湖南省立一中、江蘇無錫中學、鎮江師範、暨南大學等處

任教。後又在上海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在浙江一帶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後曾擔任過地方行政職務。新中國成立後，先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任教，繼而到上海師範學院任教。他在學生時代參加文學活動的同時，即開始研究詞學。1925年在武昌師範大學讀書時，與同學組織藝林社，創辦《藝林旬刊》，受到郁達夫的指導和重視。這年在《晨報副刊》上陸續發表了《文學欣賞引論》、《詞人辛弃疾》和《李清照評傳》等論文，出版了《中國文學概論》（上海啓智書局出版）。早期的文學作品有小說《西泠橋畔》、《愛與愁》，散文《麓山的紅葉》、《愛晚亭的風光》（藝林出版社）。1926年出版了《宋詞研究》（上海中華書局）。此後陸續出版的詞學論著有《詞學ABC》（1929年上海世界書局）、《中國詞史大綱》（1933年上海大陸書局）、《中國詞史略》（1933年上海北新書局）、《詞學概論》（1934年世界書局），主編了《詞學小叢書》（1937年上海文化服務社），編選的詞集有《詞選》（1936年上海中華服務社）、《唐宋词一百首》（1961年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宋词選》（1962年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此外還著有《唐詩研究》、《宋詩研究》和《中國文學史》等。胡雲翼一生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詞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最為卓著，是我國近幾十年來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詞學家。

中國新文學運動掀起之時，大量的西方文學被介紹進來，提出了打倒舊文學的口號：中國的文學傳統斷裂了。然而也有學者提出以新的觀念和方法來重新研究中國的舊文學，而且以為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改革文藝觀念。鄭振鐸說：“我以為我們所謂新文學運動，並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固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

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而這種工作，卻需要一種新的研究。”^②在現代詞學研究領域里是胡適開闢了新的道路，以新的社會審美觀念描述了宋詞發展的輪廓。1922年他在論文《南宋的白話詞》里認為：

詞的進化到了北宋歐陽修、柳永、秦觀、黃庭堅的“俚語詞”差不多可說是純粹的白話韻文了。不幸這個趨勢到了南宋，也碰着一個打擊，也漸漸退回到復古的路上去。……南宋的“時代文學”自然是陸游、楊萬里的詩與辛棄疾一派的詞。張孝祥、張元幹、陳亮、劉過、劉克莊都屬於這一派。……（姜夔與吳文英等）古典主義的一派，這一派的詞，在我們看來，實在是什麼文學價值，只可以代表文學史上一個保守的趨勢。^③

接着他對詞的起源問題也發表了新穎的見解^④。胡適的詞學觀點具有反傳統的意義，其研究方法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的科學方法，其表述方式採取了新的白話文體。胡雲翼正是在新文藝觀念的鼓舞下和胡適詞學思想的影響下進入詞學研究的。新中國建立以後，他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熏陶習染，使其詞學觀點在新的條件下又得到發展。胡雲翼的詞學觀點很有時代的理論特色，他初步建構了詞史的規模并充分肯定了豪放詞的歷史地位：這都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有過廣泛而深遠影響的。

胡雲翼同當時許多新文學的倡導者一樣，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批判態度。他研究詞學的目的與保存國粹的守舊派有根本的區別。在談到《詞學ABC》寫作的主旨時，他說：

第一、我寫這本《詞學ABC》，並沒有提倡中國舊文學，這是最要辨明的。我們爲甚麼要研究詞？乃是認定詞體是中國文學里面一個重要的部份，它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遺留下來許許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讓我們去鑑賞享受，我們當然不願意拋棄這種值得鑑賞享受的權利。可以說，我們的和詞發生關係，完全是建立在讀詞的目標上面。因爲要讀詞，使得對詞作一點粗淺的研究，懂得一點詞的智識。我寫這本小冊子的主旨，便只是想告訴讀者一些詞的常識，做讀詞和研究詞的幫助。目的僅僅如是而已。我絕不象那些遺老們，抱着“恢復中國固有文學之宏願”，來“發揮詞學”的。

第二，我這本書是“詞學”，而不是“學詞”，所以也不會告訴讀者怎樣去學習填詞。如果讀者抱了一種熱心學習填詞的目標，來讀這本書，即便糟了！因爲我不但不會告訴他一些填詞的方法，而且極端反對現在的我們，還去填詞。爲甚麼我們不應該去填詞？讀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詞體才說這種話。我們對於曾經有過偉大的光榮的詞體，是異常尊重的。

可是這種光榮已經過去很久了，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⑤這是從現代人的視角將詞體文學作爲一份珍貴的文學遺產來對待，而不是要去恢復這種古舊的文體。但僅僅爲了個人鑑賞享受才去了解詞學，而且極端反對現代人去填詞，這樣的看法有其片面性。我們研究詞學應有更爲深一層的意義，而某些現代人偶爾填詞也并非壞事，雖然不宜提倡。盡管如此，我們如果將胡雲翼的態度與國粹派相比較，顯然前者更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關於宋詞的特點，胡雲翼認爲它是“時代的文學”和“音樂的文學”，他說：

詞的發達、極盛、變遷種種狀態，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宋以前只能算是詞的導引；宋以後只能算是詞的餘響。……這種詞是富于創造性的，可以表現出一個時代的文藝特色。所以我們說宋詞是時代的文學。

中國文學的活動，以音樂為依歸的那文體活動，只能活動于所依附產生的那一種音樂的時代，在那一時代內興盛發達，達于最活動的境界。……凡是與音樂結合關係產生的文學便是音樂的文學，便是有價值的文學。……歌詞之法傳自晚唐而盛于宋。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聲，製詞與樂協應。又有自度腔者，并作新詞，任隨詞家的意旨，驅使文學在音樂里面活動。這種音樂文學的價值很大。⑥

這在詞學史上第一次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宋詞的特點，此後遂為詞學界所接受。基于這樣的認識，胡雲翼高度評價了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強調宋以後的詞其作為音樂文學的生命已經完結，而成了文學史上的陳物；因而根本否定宋以後詞的價值并反對現代人再去填詞。顯然詞體在發展過程中有與音樂結合的一面，也存在脫離音樂束縛的傾向；因此，它在特定的文化條件下可以脫離音樂而獲得新的生命。關於對宋詞的評價，胡雲翼雖然以時代文學和音樂文學的觀念給予很高的評價，承認其“特殊價值”，但對其“弊點”的揭示則是近于苛酷的。他說：“宋詞的弊點，我們至少可以從宋詞的頹廢發現出來。據我的觀察，宋詞有兩個本體上的病根，有兩個現象上的弊點。”其所謂兩個本體上的病根即“音數上的限制”和“聲韻上的限制”，兩個現象上的弊點即“描寫對象的狹隘”和“古詩辭意的模襲”。“宋詞既然有了這種種的缺陷，加上晚宋講究詞派，講究詞法，作品之陳

腐，千篇一律，無非爲前人作書記，其下者書畫還不如呢！這正如晚唐、西昆詩之發展一樣，國家要亡了，而他們這些文人仍沉醉于象牙之塔，高唱他們的艷歌，不知時代是何物。這不是宋詞的厄運最後臨到了嗎？”^① 似乎北宋和南宋的滅亡，宋詞都是責無旁貸的了。這未免過高地估計了文學的社會作用。如果我們聯係新文學運動以來，人們急切要求文學直面現實人生以期喚醒民衆、復興中華的時代文化心理，自然可以諒解當時對宋詞脫離社會現實傾向的嚴厲責備了。

《宋詞研究》初版于1926年，至1928年已出了第三版，它在我國現代詞學史上具有首創的意義。著者在自序里說：

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價值，而作文學史的分工工作，對於宋詞加以條理的研究和係統的敘述的專著，據我知道的，現在似乎還沒有。以前雖有詞話、叢話一流書籍，偶有一見之得，而零亂掇拾，雜湊無章。我著這本書的動機，就是想將宋詞成功組織化、係統化的一種著作。

著者并未夸大其辭，它的確是詞學史上最早的係統地研究宋詞及其歷史的著作，尤其可貴的是它以新文學觀點來研究宋詞。近世詞學家劉毓盤的《詞史》出版于1930年，王易的《詞曲史》和吳梅的《詞學通論》都出版于1932年。它們基本上採用傳統的觀點和方法，而且都比《宋詞研究》問世遲了數年。因此，《宋詞研究》的筭路藍縷之功是不應忽視的。我們應慶幸我國現代詞學開始走上一條新的道路。《宋詞研究》的上篇爲宋詞通論，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了詞的起源，特點和發展規律；下篇爲宋詞人評傳，評介了兩宋的主要詞人，基本上是宋代的詞史。著者期望它能使

讀者明了詞的內涵外延，知道宋詞發展和變遷的狀態，審識宋詞作家作品及其生平，從而對詞的欣賞和研究發生更大的興趣。《宋詞研究》是胡雲翼全面研究詞學和詞史的基礎。以後，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詞學專著《詞學ABC》和《詞學概論》，形成了詞史專著《中國詞史大綱》和《中國詞史略》。胡雲翼關於詞學知識的介紹，不同于梁啟勛等人集中講解詞的體製、聲韻及作法，而是注重理論的探究。在《詞學ABC例言》裏，他將詞學的範圍概括為四個方面：

一、甚麼叫詞？已是頗不易回答的問題，本書從詩詞的分野上，從詞的特質上，而下一定義。

二、本書依歷史的考察，最先說明從詩到詞遭變的理由及其路徑，以期闡明詞在文學史上所留的痕跡。

三、詞的起源，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書一一加批評，並從詞與樂的關係上作一答案。

四、詞的發展歷史，乃為研究詞學最切實重要之部分，本書詳加敘述。並指示著名作品，以助欣賞。

這為詞學的宏觀研究開創了途徑。胡雲翼關於詞史的面貌作了較細的描述，如在《中國詞史略》裏追溯了詞的起源，關於晚唐五代詞分別介紹了晚唐詞、西蜀詞和南唐詞，關於北宋詞則分為四個發展時間來評述，關於南宋詞則分為南渡詞壇、南宋的白話詞、南宋的樂府詞、晚宋詞來評述，對金詞、元詞和明詞也分別作了簡要介紹，關於清詞則分別評述了清初詞、浙派詞、常州派詞和清末詞。其中評介的詞人約百餘人，闡明了詞史的流變，剖析了詞派興替的原因。從上所述，可以認為胡雲翼為詞學和詞史的研究建構了初步的系統與規模。

在傳統的詞學觀念中，蘇軾與辛棄疾等豪放詞一直被認為是“變體”或“別派”，而認為晏殊、周邦彥、李清照、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婉約詞才是詞體“本色”和宋詞傳統的“正宗”。胡雲翼研究宋詞特別突出了豪放詞的歷史地位，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在詞學史上是具有反傳統意義的。早在1925年，胡雲翼于論文《詞人辛棄疾》裏便表露了對豪放詞的態度。他說：

北宋爲了受金兵不堪的壓迫，把一個都城不得已的由汴京移到臨安來，政治上顯示了多少的紛動，社會上感受無窮的瘡傷。經過這樣巨大的犧牲以後，而所成就的，不過助長幾個英雄志士的成名，幾個詩人詞客作品的成功而已。弃疾便是成名的英雄裏面的一個，同時又是成功的詞人裏面的一個。偉大的詞人辛棄疾，近人王國維氏評他說：“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相頡頏者，惟一幼安耳。”其實，我們即老實說辛棄疾是南宋第一大詞人，也不算是誇張吧。^⑧

胡雲翼發展了王國維推崇北宋詞的觀點和胡適關於白話詞的理論。他在《宋詞研究》裏論述宋詞發展過程時，對宋詞發展的綫索已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如說：

詞體經過五代至北宋長期的發達，無論在小令方面、長調方面，婉約的詞或是豪放的詞都有專門的作家，極好的作品。本來體格謹嚴的詞體，描寫對象又是很狹的，經過這麼長期的開展，差不多開展已盡，無路可走了。而且北宋詞既有很好的成績，很好的作品，作為範本，南宋詞人不由的，便走上古典主義的路上去了。講詞派，論詞體，講求字面，講求雕琢，盡在作法上轉來轉去；雖有警字警句，而支離破

碎，何是名篇名家！況所謂作法之講求，也不過以北宋名家詞爲摹本。是則雖有成就，無非北宋人之皂隸，更何能超北宋而上之呢？故在量的方面講，南宋詞或成熟發達到極地無以復加了；若論到詞的本質，則南宋詞確乎是詞的末運了。⑧

繼而胡雲翼在《詞學ABC》裏更鮮明地肯定豪放詞的歷史地位，認爲：

詞體之得着解放，自蘇軾始，柳永雖然倡導了慢詞，還是因襲晚唐五代詞的曼艷風氣，還沒有打破“詞爲艷科”的約束。到蘇軾便把詞體的束縛完全解放了。他一方面超越了“詞爲艷科”的狹礙範圍，變婉約的作風爲豪放的作風，一方面又擺脫了詞律的拘束，自由地去描寫。……

我們則認定這種“別派”，是詞體的新生命。這種新詞體離開了百餘年來都是這樣溫柔綺靡的舊墟，而走上一條雄壯奔放的新路。這條路可以使我們鼓舞，可以使我們興奮，而不是叫我們昏醉在紅燈綠酒底下的“靡靡之音”。⑩

從胡適、胡雲翼以來對豪放詞的贊賞與對婉約詞的貶抑的詞史觀點，是與中國現代社會的動亂不安和反傳統的思潮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分不開的。這種詞史觀點帶有兩極意識的特色，因而在新中國建立以後遂與盛行的社會學方法有某些相近或相通之處，于是它得到了極爲充分的發展。在六十年代出版的《宋詞選》裏，胡雲翼發展了其前期的詞史觀點，認爲豪放派是宋詞的主流。他說：

詞至南宋發展到了高峰。向來人們都認爲宋朝是詞的輝煌燦爛的黃金時代，如果把這話說確切一點，這光榮稱號應